

《历年记》中所见明末清初新闻消息 在民间的传播

戴新宇

(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历年记》是生活在明末清初的上海人姚廷遴所编写的个人日记,里面记载了不少他所收集的新闻。在明清鼎革、社会动荡之际,新闻信息成为沟通政府和民众的桥梁,这桥梁也不失为研究当时地方社会状况的一条途径。对于当时的平民来说,新闻已经切实参与到日常生活当中,人们通过报纸、告示等媒介获得新闻,并依靠这些新闻来指导生活、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以及娱乐消遣。同时,民间对新闻的加工与反向传播最终推动了舆论以及民间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历年记》; 明末清初; 新闻; 舆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21)01-0032-06

《历年记》是生活在明末清初的上海人姚廷遴所编写的个人日记,里面按时间顺序记录了从明崇祯到清康熙年间姚廷遴的种种见闻,其中就有不少他所收集的新闻。这些记载已经被一些学者所注意到,比如史媛媛在《清代前中期新闻传播史》中用这些材料来说明当时报纸等新闻媒介的特点,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在《崇祯十七年的江南社会与关于北京的信息》中也以此为论据研究崇祯之死这条新闻在江南社会传播的情况,她的另一篇论文《清初上海地方人士的国家观》则对姚书中出现的政府新闻的特点做了分析,以此来说明当时民间的国家观念,不过有关《历年记》中所反映的民间新闻传播整体状况的研究笔者尚未见到。本文尝试通过分析姚廷遴所记录的这些新闻,从当时的民间视角出发,研究明末清初新闻信息在上海民间传播的基本情况,特别是这些新闻当时在民间所产生的影响。

一、新闻传播的媒介

来自各方的消息要传递到民间,首先需要考虑的是途径,也就是新闻传播媒介的问题。《历年记》中明确提到的媒介主要有报纸和告示两种。其中,报纸有大报、小报、塘报三类,试举一例:

忽报沈伯雄来,觉仓皇之状,手持小报云:
四月二十五日,闻贼攻破京师,崇祯帝自缢煤山

等语。……不一日有大报到,民间哗然。又不一日,报福王监国南京。又闻即位称帝,先红诏,次白诏,俱到,乡绅官府哭临戴孝。^{[1]54}

从这条记载可知,姚廷遴最先是通过小报知道了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的新闻,时间是在崇祯十七年五月五日。根据岸本美绪的研究,崇祯帝之死的消息在四月中下旬已经传到南方但被政府所封锁,直到五月四日由监国的福王发布哀诏才传遍江南^{[2]27},姚廷遴所说的沈伯雄收到的小报应该就是此时发出的。所谓小报,即民间报纸,其名称是相对于官方发行的大报即邸报而言。由于小报报道的内容是未经官方审核的消息,未必可靠,像姚廷遴看到的小报称李自成攻破北京是在四月二十五日,这显然是失实的。不过这份小报比大报早了快一天送到,说明在新闻传递的时效性上民间报纸要优于官方正式新闻。

上述记载中还提到了大报。岸本美绪认为,这份大报实际上可能只是一种特殊的告示:“《历年记》中提到的‘大报’与这种告示的内容是不同的,但也许这种发行并广泛散布的告示或称为‘大报’。”^{[2]31}应当说,像崇祯帝之死这种大事政府会通过多种途径告知民间是很正常的,比如之后福王登基的消息姚廷遴是通过“红诏”“白诏”得知的,而在

黄宗羲抄录弘光朝邸报汇编而成的《弘光实录钞》中,第一条是福王监国,其后是福王登基^[3],说明这两条新闻也通过官方的邸报进行传播。《历年记》中的另一条材料也可从侧面证明这类情况:

是年正月初七日,帝崩。不数日有报到,新君登极,时年八岁,改元康熙。^{[1]83}

这是顺治帝驾崩、康熙帝继位的新闻。这种消息在承平时期显然必须由朝廷正式颁下文书发往全国,姚廷遴是从“报”而不是“诏”上看到的这条新闻,这表明当时确实存在用报纸来传递国家重大消息的惯例,民间也习惯于从报纸上获取相关的新闻。

除了大报与小报,《历年记》中还有一条关于塘报的记载:

二十五日县中出示,为塘报事,内云吴逆三桂于八月十七申时病痡身死。^{[1]111}

塘报出现于明代,是一种从下至上传递军事信息的媒介,未经允许里面的内容不能传播到民间^[4],因此吴三桂病死的新闻真正传到姚廷遴耳朵里还是依靠官府张贴的告示,塘报只是作为中间载体而已,并不是民间常见的新闻媒介。

纵观《历年记》全文,提到报纸的次数并不多。当时,不论是官方邸报还是民间小报,其阅读者主要是地方官员以及有志于官场的文人,自称在官府当幕僚而“沦落十五年”的姚廷遴对报纸不感兴趣也很正常。相比于报纸,告示在《历年记》中出现的频率更高,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一种对生活影响更大的新闻媒介。告示根据其发出的机构可以分为皇室诏书、皇帝谕旨、中央机关告示、地方官员告示四类^[5]。在记录这些告示的内容时,姚廷遴对前三类不加区分,除了遗诏,凡是来自北京的告示都被他称为“谕旨”,而当地官府发出的告示则被他称为“告示”,这两种告示在公布的渠道上多少会有些区别。

一般来说,不论中央还是地方的告示都会在人流密集处直接张贴,但作为邸报的主要内容之一,皇帝的谕旨也常常出现在报纸上。比如康熙三十四年底朝廷大赦,姚廷遴在次年正月二十一日提到“朝廷赦历年拖欠钱粮,此时方有报到,赦款多极”,这条消息是通过“报”传到他耳中的。当然由于报纸并非所有人都能看到,这种新闻仍然要依靠地方政府的告示才能传到民间:

十二月十五日黄昏时……方知朝廷赦免二十六年及二十七年钱粮。十八日田抚院告示张挂,内云为钦奉上传事。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旨传出:……此示一挂,百姓大悦。^{[1]128-129}

姚廷遴曾在官府当幕僚,像邸报这种一般只能在官府才能看到的文书,以及一些尚未公布的消息,他可以接触到,能够提前打听到这些内容,但一项国家政策真正要传到民间,还是得依靠告示这种更方便且传播更广的手段。因此,作为一种新闻传播媒介,告示无论在使用频率还是民间影响力上都要高于报纸,这点从《历年记》中提到两种媒介的数量上就能看出来。

另外,来自中央的谕旨除了直接向民间公布,地方政府往往还会另写一份告示与谕旨一并张贴出来。比如康熙二十五年禁止五圣庙,上谕的内容是“严禁五圣庙,立毁其像,民间如有私藏容隐,则十家连坐;禁除太保,着令改业;巫祝、卜店不许判断,违者以逆旨论罪”^{[1]122},而江苏巡抚汤斌下发给各府县的文书内容则是“凡城市村镇乡僻去处,但有五圣庙堂者,立时拆毁,屋料砖瓦等共着该地运送入官,备修学宫及公馆”^{[1]122}。可见,朝廷只是公布大的方针政策,具体怎么执行由地方政府安排并告知百姓,姚廷遴能抄下谕旨和巡抚公告的具体内容,显然这两份文件都在民间公布了。

对于来自中央的谕旨,时效性问题始终存在。在姚廷遴生活的年代,南北交通虽然已经十分便利,但北京和上海之间的距离仍算得上十分遥远,北京的新闻传到上海着实要花费一番时日。根据姚廷遴《历年记》中所记录的部分消息收到以及事件实际发生的日期,可以考察这些来自北京的新闻传到上海所用的时间。例如:崇祯帝之死的消息是崇祯十七年五月五日收到的,此时距崇祯于三月十九日在煤山自缢已经过了 46 天^{[1]54};顺治十八年康熙帝登基的消息所用的时间是“不数日”^{[1]83};康熙二十六年蠲免钱粮的谕旨是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传出,地方告示则在十二月十八日张挂,中间隔了 22 天^{[1]129};孝庄太后去世的遗诏在康熙二十七年正月十四日传到上海,此时距离其去世的时间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已有 20 天^{[1]131};孝懿仁皇后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十一日去世,18 天后的七月二十九日消息传到上海^{[1]135};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宣布大赦,姚廷遴在康熙三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左右才看到刊载相关消息的报纸,时间间隔约 34 天^{[1]152}。大体来说,二十多天应是当时条件下新闻从北京传到

上海的正常速度,像顺治驾崩、康熙登基的新闻应当是作为最重要的消息快马加鞭向全国传递,“不数日”便传到上海,时间少于 20 天是可能的,不能视为平常新闻的传播速度。在承平时期,由于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紧急的事件,这个时间对人们来说关系不大,但在特殊时候,比如明清交替之际,来自北京的新闻不仅不能及时送到,而且还因为官府的刻意封锁而被大大推迟了,此时的延误对人们来说影响就很显著了。

前面讨论了《历年记》中出现的报纸和告示这两种在民间传递新闻的媒介的特点,除此之外,《历年记》中还有大量没有提到传播媒介的新闻。这类新闻往往是“听说”的,即口头传播,在数量上较之有确定来源的新闻更多。对于这种口耳相传的方式,也有必要做一个简单的讨论。试举几例:

哄闻满洲之女子发配中国男子,中国女子要配满洲男子,名曰满汉联姻。^{[1]70}

十六日出邑,即闻吴三桂谋反……^{[1]107}

是月二十八日起至八月初一止,传闻京师地震……^{[1]112}

口耳相传的新闻其来源与传播渠道往往模糊不清、内容庞杂且真假难辨。上面这几条消息,三藩之乱这种大事自然是真的,而满汉联姻就是典型的以讹传讹的假新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口头传播的新闻全都是假的,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起不到积极作用。在清兵渡江前后,姚廷遴记录了很多当时南明军队的动向,按他的说法是因为“唐姑父此时任龙潭营参将,故知其详”^{[1]56}。在战乱时期,军事消息可谓价值千金,这种内容不可能通过官方文书了解到,依靠熟人互相打听就成了民众最有效的信息源,其中假新闻自然不可避免。但对于平民来说,不论真假,身处战火之中能够知道军队可能的动向却是关乎身家性命的大事。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口头传播的新闻有相当一部分或许可以追溯到报纸、告示等确定的新闻媒介。比如,“是日会见莫孟嘉。据云曾见小报内有山西平阳府洪洞等三县,于四月初六、七、八三日,大雨地震……”^{[1]150},这是他人看了小报后再转告姚廷遴。再比如,三藩之乱爆发的消息虽然是姚廷遴出城后听说的,但这种新闻官府必然要张挂告示,而且从后面记录了详细的调兵遣将的情况来看,他看到了官方报纸或告示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对于一些新闻而言,口头传播可能只是进一步扩大了其在民间传播的范围,真正传到大众中间还是依靠报纸告示等媒介。

二、新闻信息对民间的影响

由于《历年记》是姚廷遴编写的私人日记,里面记载的新闻内容显然是经他筛选过的,不能反映当时民间新闻传播的全貌,如果要研究当时新闻的内容构成则还需要更多的材料。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姚廷遴身为生活在清初的普通读书人,他的这种选择代表了当时一般民众的普遍兴趣,从中可以看出新闻对他们的意义。比如:

八月,闻耿精忠结海中郑仅,攻温、台等府,我松提标前营陈副总,被炮打死。据传领兵马二千,在温州浮桥上过去,被贼一炮打来,打成血路,陈副爷打去一腿,好不利害!^{[1]107}

这是三藩之乱时耿精忠与郑经联合进攻沿海地区的新闻。三藩之乱是震动整个中国的大事,上海离战场不远,是承担兵饷兵役的主要地区,当地民众自然十分关心战事。这条新闻的特点在于,它的主角是当地提标前营的陈副总,而且对陈副总的死作了非常具体的场景描述,同时事情发生的地点是离上海不远的温州。《历年记》中有关三藩之乱的记录大都十分简略,连尚可喜的名字都没有出现过,反倒是对耿精忠起兵和投降的过程有比较具体的记载。也就是说,对于三藩之乱,除了吴三桂,姚廷遴只关注发生在离家乡不远的耿精忠与郑经的战事。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条新闻姚廷遴是“听闻”而来,其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特别是陈副总战死的细节,这么细致的描写很有可能是人为加上去的,但姚廷遴愿意相信并特意记下了陈副总战死这条新闻,加上对三藩之乱“厚此薄彼”的态度,说明他更关心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与自己密切相关的新闻。应当说,关注发生在自己周围的新闻是人之常情,因为它们往往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影响。那么,对于姚廷遴以及那个时代的平民来说,新闻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到他们的生活中去了呢?下面就这一点进行讨论。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这些新闻消息在当时出现的频率有多高。据岸本美绪统计,《历年记》中有关“国家”“朝廷”的新闻记载共 44 处^[6],而这仅仅只是政府方面的消息,地方社会新闻尚未包括在内,同时考虑到这已经是经过姚廷遴筛选后留下的,那么实际上他看过的新闻数量只会更多。从上文有关媒介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到,姚廷遴已经习惯了从各个渠道获取新闻,说明新闻在他的生活中并不罕见,各种信息在民间的传播交流已经十分频繁。

人们这么频繁地去传递交流新闻消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欲从中获得必要的信息以便在生活中作出应对。特别是姚廷遴曾经历明清鼎革,他曾提到,弘光元年时“自清兵临县后,毋论城市村镇人家,俱用黄纸写‘大清顺民’四字,粘在门上,忽闻孔兵来,即扯去”^{[1]62}。可见,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及时了解各种消息对平民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故在得知史可法战败后就会出现“此信一到,分头奔窜,老幼惶惶”^{[1]56}的一幕。即便在清朝已经基本上坐稳了江山之后,民间仍然会因为一些风吹草动而出现骚动,最典型的事情是有关朝廷选秀女、满汉联姻的假新闻:

夏间讹传朝廷采选秀女,府县城镇乡村僻壤,有女在家者俱惊惶无措,早说暮成,俱幼婚配。不必三杯水酒,只用一鼓一笛,甚至良贱不拘,岂论贫富难匹。限时限刻,从早至暮,从暮达旦,无论日之吉与不吉祥,周堂利于不利,遍地结亲,亦希遇之事。^{[1]64}

类似谣言在顺治四年、五年、十年和康熙三十一年共计出现过四次,每次民间都是一片惊惶,出现“遍地结亲”的现象。一方面,这说明当时江南的民众对清朝这个异族政权仍抱有很强的戒心,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一条新闻不论真假,民众会根据其中的内容作出判断和反应,并在社会层面上体现出来。当然,普遍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对清朝的不信任是这类新闻出现的根源,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新闻是导致这些行为发生的直接原因,各种真假难辨的新闻信息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在社会稳定之后,新闻对普通人乃至全社会的指导作用仍然存在。比如,康熙二十五年朝廷下旨禁五圣庙后不久,原本被地方民众祭拜的五圣就被传为当时嘉兴、秀水两县瘟疫的元凶,而之后又出现了吃甘蔗能治病的说法,于是“甘蔗一时贵极,直有到松江、上海两地来贩去者”^{[1]122}。这一事件中人们的生活受新闻信息传播的影响发生了两次变化,一次是中央禁止五圣庙的消息让五圣崇拜迅速发生变异,一次是疫情中出现的谣言让甘蔗价格飙升,可见在姚廷遴生活的年代,人们的生活已经开始围绕各类新闻信息展开,新闻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百姓生活的“指挥棒”。

对于姚廷遴来说,新闻除了能告诉他生活必要的资讯,还能给予他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感,从朝廷的角度来看这就是新闻的宣传与教化作用。清朝初建,江山未稳,安抚民心成了当务之急,来自朝廷的谕旨以及地方官府的公告成了当时政府最常用的工

具,最典型的便是朝廷下发的有关大赦的谕旨。大赦谕旨是一种很有特色的新闻媒介,一方面地方官府会把谕旨的全文张贴出来,所有人都能看见,因此传播得很广,姚廷遴在《历年记》中就抄录了不少;另一方面谕旨的内容不只是公布赦免结果,还会把实行大赦的原因说出来,比如皇帝亲政、北伐得胜或体谅民情等,这就意味着中央层面将国家政策直接向民间进行宣传,比如下面这条:

二月初即闻驾在宿迁,传各大臣面谕云:“朕未出京时询户部,知江南全省所欠历年钱粮,自十九年起,共结二百二十万余万两。昨入宿迁境内,观民比往岁南巡稍加富庶,则知朕连年蠲免钱粮,大有益于民也(后略)”等语,真天语煌煌。即日有总督、抚院、漕院、总河等印刷告示,到处粘贴,民情大悦。^{[1]133-134}

这是康熙二十八年南巡时所发大赦的谕旨,在进入主题之前,康熙用了一番话来回顾之前大赦,说江南百姓生活更加富庶等,最后才是有关这次大赦的内容。如果单从能够指导人们生活有效信息来考虑,那么前面一大串说词都是没用的,但姚廷遴在这后面附上了“真天语煌煌”的评语,显然指的就是前面“没用”的部分。康熙希望通过大赦获得民众认可与爱戴,从姚廷遴的评论可知他的目的达到了。如果从完全功利的角度来看,引发大赦本身的事件,不论是康熙亲政还是征噶尔丹,好像都与普通人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对于普通人来说,了解这类新闻不仅意味着关心国家大事,更重要的是对朝廷施政的认可,能够产生某种“与有荣焉”的情感。因此,当姚廷遴听说朝廷举行养老之礼后,会发出“不知其开销几十万两也”^{[1]136}的感慨也是很自然的了。除了国家层面,地方政府也会通过新闻媒介进行宣传教化,比如康熙二十五年巡抚汤斌离任进京,百姓挽留,于是“抚台另有告示,晓谕百姓,委曲安慰,惨切倍常,即如班超脱靴之语,刊布民间传诵”^{[1]123}。这与朝廷的谕旨作用类似,起到了协调当地民众与社会及官府之间关系的作用。当然,政府进行宣传教化的渠道很多,像康熙南巡本身就是如此,但这种大费周章的活动不可能经常进行且直接覆盖的范围有限,对于生活在中国广袤土地上的百姓来说,不时出现的有关朝廷的新闻成了他们与在北京的皇帝产生联系的最直接也是最便利的途径,就像一种黏合剂一样将姚廷遴们和国家粘连在一起。

诚然,并不是所有新闻都具有宣传教化功能,《历年记》中的一些新闻虽然记录得非常详细,但内

容却有许多问题。比如,前文所引有关耿精忠和郑经联合进攻温州的新闻,就有“据传领兵马二千,在温州浮桥上过去,被贼一炮打来,打成血路,陈副爷打去一腿”的记叙,可信度似乎并不高。对于当时人来说,这种新闻并不能增加他们对三藩之乱真相的了解,更不可能是朝廷用来安抚民众、壮自己军威的,它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足够吸引人的话题,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种对待新闻的态度还可从另一条材料中看到:

十五日差人到,是日会见莫孟嘉。据云曾见小报内有山西平阳府洪洞等三县,于四月初六、七、八三日,大雨地震,房屋坍倒,压死多人,既而地中出火,烧死人畜、树木、房屋、什物无算,随又水发,淹死人畜又无算。闻有亢姓者,系敌国之富,亦遭此劫。地俱沉陷,朝廷差官勘验,发帑赈济,拯救难民,查报只存活六万口有零。又云系火龙作祟,地陷山崩,如此灾异,古今罕见。^{[1]150}

这是姚廷遴与莫孟嘉见面时听到的,他并没有看到记载这条新闻的小报。这条有关山西地震的新闻中诸如“火龙作祟”的说法,表明这条新闻已经过了人们的加工,不是完全真实的信息。姚廷遴从莫孟嘉那里听说后把它记录下来,虽然没有实用价值,但作为消遣娱乐的材料还是不错的。

三、民间对新闻信息的反向传播

上文的分析是基于平民百姓作为新闻的接受者展开的,但新闻在民间的传播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在一个完整的传播模型中,民众利用各种途径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反馈是必要的,也就是双向交流,此时民众从信息的传播对象变成了传播者。这种反馈的形式有多种,民间舆论便是其中之一。《历年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合县百姓不服,罢市三日。县公立放出禁,亦觉临去作差。有朱单粘在大门东首,云:“本县莅任六载,从无过误,唯盐商一事,亦奉上行。尔百姓见疑,本县有不肖之心,本县不独无其事,倘有私心,阳有国法,幽有鬼神。但县宰无设誓之体,自思六载苦心,一旦化为灰冷,不得不痛心耳。”自此人家俱复开门。至晚,又有人粘四句在朱票之后,云:“罢市三朝世所稀,村郊随处说萋菲。若非身死江边咒,安得清名万古题。”^{[1]124-125}

这是康熙二十五年食盐私卖所引发的官民纠纷。当时官府允许食盐私卖,但盐商从中作梗,最终闹到了全县罢市的地步,于是知县不得不在县衙门口贴了张单子来自辩。之后,有人又跟贴了一张,表示官民最终和解。县令这份自辩是官员主动寻求民间舆论的支持,作用类似于上文提到的宣传教化、协调社会;民众则通过罢市后复市这种具体行为以及贴纸条的方式作出回应。特别是这张单子,一来一回之间实现了意见的交流,相比于罢市这样的行动更能将民间的主张清晰地表达,成本也更低。这种情形在《历年记》中多次出现,说明当时官民之间已经通过舆论实现有效交流了。

需要注意的是,民间舆论的目标读者不仅仅是政府,它同时也是在向整个民间传播意见。比如:

此时有人将陈知县劣迹贴到苏州、松江,府城、省城遍地俱有,而府厅官不以为意。贴云:“封封拆欠,斛斛淋尖。官官相护,说也徒然。”此四句捷径好极,上台亦置不问。^{[1]155-156}

《历年记》中记载了不少当地百姓对陈知县征税过于严苛进行反抗的事件,包括有人到处贴这四句话。尽管没有得到官府的回应,但姚廷遴在后面附上了“好极”的评价,说明这种舆论意见在民间已经被广泛传播并得到了积极回应。在长期得不到官府回应的情况下,人们的不满会在不断的舆论传播中慢慢累积,到了一定程度后成为民间某种共同的情绪,此时这种通过贴纸传播的舆论就不是逞口舌之快,而是集体行动的宣传单:“突有浦西一带饥民,遍贴报条,约合县饥民,要与知县讨常平仓每年所积之谷赈济,日有几百在县堂挤拥。”^{[1]157}《历年记》中记载了多次民众自发的集体行动,其中以对陈知县的反抗最为持久、激烈,这与舆论持续在民间传播、发酵密不可分。

当然,不是只有写在纸上贴出去的才算民间舆论,人们通过口头传播或直接行动所表达的意见同样是舆论,比如贩卖私盐事件中的罢市、康熙五年的告御状、弘光元年关于南明朝廷的歌谣等,这里不再讨论。舆论传播形式的多样以及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让官府不得不重视,为此当时的官员甚至不惜伪托情事:“十六日晚,忽有人鸣锣道董知县好处……将总书霍元龙夹四夹棍,招出将银四钱买秀才陈五葵写董知县德政好处等语。”^{[1]140}虽说这个董知县的行动只是为了保住官位,但却反映出当时的民间舆论能够对地方官造成一定压力,这也是前述贩卖私

盐事件中史知县不得不贴出自辩状以寻求民众谅解的原因。

如果将这种舆论与前面新闻在民间的传播结合起来,可以看到以平民为中心,新闻信息的传播形成了社会治理在民间的完整流程:政府实行某项政策,必然要通过某些媒介将意图传达到民间,然后根据人们的反应作出调整。而对于处在这个流程中心的姚廷遴们而言,除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作为各类新闻信息的接受者,他们也需要通过新闻了解包括政府政策在内的周围各种突发事件以便作出应对,生活会随着这些消息发生改变。同时,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新闻也让他们和这个国家、社会产生了联系,强化了身为国之子民的意识;而作为民间舆论的发出者,他们会将自己对政府政策的不满通过一些新闻渠道表达出来,一方面实现同政府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也实现了民众内部的交流。人们通过这样一个渠道实现了有效交流,许多社会矛盾在这样的互动中得到了解决。

另外,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舆论只是人们对接收到的新闻进行反馈的一种途径,除了“指挥棒”和“黏合剂”,获取新闻对姚廷遴们来说还意味着可以进行娱乐消遣。《历年记》中曾提到“京师之变,未及两月,即有卖剽闻小说一部,备言京师失陷,先帝将国母及公主俱手刃,然后出后斋门自缢于煤山”^{[1]55},短短两个月,崇祯之死的新闻已经迅速变成了小说家的素材,那么在从新闻到小说之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在这条记载后面姚廷遴写道:“我郡有宦朱早服、李逢申任京宪要而受辱者。忽有粘一对于府前云:‘朱帝失朝,皆为群臣早服;李贼篡位,只因太岁逢申。’”^{[1]55}显然这幅对联是民间对新闻加工后再创作的产物,从收到北京失陷群臣受辱的新闻开始,经过当地人刻意筛选后挑出最熟悉的两个官员进行联想创作,最后通过张贴对联的方式进行传播。

因此,出于某种消遣的心态,人们将新闻和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联系起来,加工之后重新传播出去,如此形成了一种民间对新闻的反馈途径,具有文学创作上的意义,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谣谚的来源。姚廷遴说弘光时民间“歌谣甚多,余但录此,以见时事大都如此”^{[1]55},可见当时这种创作活动的兴盛。当然,谣谚一类也往往承担了民间舆论的功能,这点上文已经提及,娱乐与舆论两个方向应该说是并行不悖的;不过从传播的形式上来说,虽然传播者都是普通民众,但出于娱乐目的的歌谣传播对象只有民间,而舆论除民间之外政府也是其重要的目标。

既然有了对联、歌谣这类较为简短的形式,那么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后出现更长篇幅的小说也是有可能的,可惜《历年记》对此没有提供更多的记录,关于民间在文学层面上对新闻再创作的情况无法进一步展开了。

四、结语

从《历年记》中有关新闻传播的记载,可以看出明末清初上海地区民间新闻传播的情况。当时民间已经习惯从报纸、告示上获得各种新闻,其中报纸又分为官方发行的大报与民间发行的小报;除了这种有形的媒介,口耳相传也是民间新闻传播的重要渠道,只不过其中部分新闻的源头仍可以追溯到报纸、告示等。面对各种各样的新闻,人们最关注的是发生在身边、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内容。对于姚廷遴们来说,新闻提供的信息已经成了生活的指挥棒,通过新闻,普通民众与国家、社会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另外,人们也会把新闻当成平时闲聊消遣时的材料。在接收到新闻之后,人们也会对之作出反馈,于是形成民间舆论。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政府与民间形成了有效交流,许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而出于用新闻来消遣的态度,人们会对新闻进行再加工,这与小说等民间文化的发展之间也存在关联。可以说,在姚廷遴生活的年代,新闻传播已经切实参与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为民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姚廷遴笔下可以看到,人们已经习惯了新闻的存在,其影响也在人们身上客观发生着。既如此,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研究当时的社会治理模式以及民间文化的发展、传播与流变或许是一个可行的思路。

参考文献:

- [1] 姚廷遴. 历年记[G]//本社编. 清代日记汇抄.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2] 岸本美绪,底艳,赵世瑜. 崇祯十七年的江南社会与关于北京的信息[J]. 清史研究,1999(2):25-32.
- [3] 黄宗羲. 弘光实录钞:卷一[M]//南明史料(八种).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 [4] 尹韵公. 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 [5] 史媛媛. 清代前中期新闻传播史[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 [6] 岸本美绪. 清初上海地方人士的国家观:第三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文集[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 文川]